

大教育家胡敦復先生傳

楊 愷 齡



像遺生先復敦胡

先生姓胡氏，名敦復，以字行，生清光緒十二年丙戌正月十四日（西曆一八八六年三月十九日），宋安定先生三十一世孫也。安定先生以經術教授吳中，從者實繁其徒，慶歷中講學太學，望重儒林，孫達庵先生始講學無錫，居邑之北鄉天授鄉堰橋鎮村前者，將及千年矣。清德綿延，世為望族。果傳至先生曾祖考念喬先生、曾祖妣蔡太夫人，以儉約儒素矜式鄉里。生先生祖考和梅先生諱麗榮，為邑廩生，出仕桃源縣（即今泗陽縣）教諭，配高太夫人諱梅麗，邑之西嶂人，賢淑敦厚，生丈夫子四：長即先生考聚脩先生諱爾平，中年後改字壹脩，次爾平字雨人，三爾洽字合如，四爾□字保如。壹脩先生及弟雨人先生目擊清政腐敗，留意經世致用之術，倡導新學，敬恭桑梓，凡修建始祖安定先生家祠，開闢地方公園，創辦天授鄉公學，後改胡氏公學。民國建立，天授鄉改為天上市，陸續擴充全市小學初中高中至六十所之多。創設市立圖書館，以啓民智。開濬河道，以弭水患，築壩圍岸，開墾荒田，以裕生產，其他修橋築路有益地方者，莫不盡力以赴，故一時天上市民氣丕轉，學風大盛。壹脩先生配同邑薛冠香先生女，年二十二于歸，結縭四十八載，生子三女七，鞠育督教，治家慕嚴，暇復盡瘁公益，協助校務。子三：長即先生，次明復，三剛復，俱卓然碩學，蜚聲國際。女七：彬夏、蔚蘭、小蘭、範若、惇五、六英、芷華，除三女早殤外，亦均能一秉母教，學而有成。彬夏、範若暨先生德配華夫人桂馨女士，均留學日本、美國，有聲於時。先生叔雨人先生為一代名師，游學東瀛，專研教育，先生髮齡即從之讀，故中英文數學之根基深厚，新舊學無所不通。年十二就讀上海南洋公學，復入震旦學院習拉丁文，從馬相伯、蔡子民、吳稚暉諸名師游，光緒三十年（西曆一九〇四年）赴美國康乃爾大學哲學系讀，專攻天文學及數學，每試輒名列前茅。越三年畢業返國，適外務部以美國退回庚子賠款助學生赴美留學，成立游美學務處，總辦為周自齊（子廩）先生創設遊美肄業館，旋呈准改為清華學堂，招收學生卒業後資送赴美深造，聘先生為教務長，綜理一切。先生對培植青年素具抱負，主張在美國退回庚款而清華學堂尚未有畢業生以前，原經中美雙方議定就國內已具有可入美國大學之青年，其年齡在二十歲以下，均經考試錄取後，由中美兩國雙方同意，先行資送赴美留學。遂於宣統元年（西曆一九〇九年）八月，宣統二年（西曆一九一〇年）七月，宣統三年（西曆一九一一年）七月，主持舉行三次甄別考試，計第一次考試錄取梅貽琦、徐佩瑛等四十七人（先生弟剛復亦錄取在內），同年八月二十九日放洋，每生得領治裝

費、川資、途中住店費、飯食費、在校學費、月費、以及醫藥費、轉學旅費等，均由游學生監督審查支付。第二次考試錄取趙元任、胡適、竺可楨等學生七十人（先生弟明復堂弟憲生亦錄取在內），以上考選二十歲以下之學生謂之第一格（即高等科）。同時錄取十五歲以下之幼學生，謂之第二格（即中等科），第二格考生由各省遴送外務部學部覆試挑選得十一人，送入肄業館學習，與第一格錄取生一併放洋就讀。先生在宣統二年八月且親自率領學生同船赴美，與美國各著名學校接洽，為之全部安排入學。第三次錄取學生陳長衡、張福運、衛挺生等六十二人，亦於同年八月放洋至美就學。先生釐定每次考試兩場，先考國文、英文，及格者方許應考第二場各種專門學科，兩場及格方可名登金榜，故錄取學生必為三育兼優之青年，至美亦以分別進入著名大學讀理工科者為多，規定留學為五年，而留學生監督處每期必審核其學校成績，如轉校轉科亦須經監督處核准，此一百九十名學生率皆名列前茅，卓然有成，先後歸國，對以後數十年國家現代化之貢獻，厥功尤偉。但先生則因辦學志趣與學務處時有抵觸，無以克展抱負，乃保薦張伯苓先生自代。而為貫徹其教育宗旨，爰集合任教清華之同志十人，在北京創設立達學社，準備興辦學校及編譯書籍。值武昌起義，民國肇建，辭職南返，在上海賃租肇周路南陽里房屋成立大同學院，先生自任院長，於三月十九日開學，暫設大學預科為出國留學之預備，立達學社之社員均在大同學院義務教課，旋又遷南市豐記碼頭陳氏屋上課，算路藍縷，備著辛勞。時二弟明復既獲康乃爾大學暨哈佛大學哲學博士，三弟剛復得哈佛大學物理學博士，亦在美國創立中國科學社，肆力提倡科學，俾使在美學生中造成甚多科學家，致力中國建設也。先生則專心致力於大同學院之擴充，在滬杭鐵路附近購地九畝，押借銀行款自建校舍，民國三年夏即在新校舍上課，其間逐漸成立文、理、商各科及附屬中學。至民國十一年北京教育部長湯爾和核准改為大同大學，是為核准之第一所私立大學。但處處紉於經費，教職員待遇菲薄，先生仍得兼任各大學教授，以維生活。先生且在南洋中學兼課，如有教授請假，無不由先生代理上課，傳道解惑，對任何學科均能應付裕如，諸生皆翕然贊頌焉。民國十四年上海地方紊亂，又擺脫校務商請曹惠羣（梁廈）先生擔任大同校長，一度奉北京政府任命為國立東南大學校長，然以前校長及教授不願合作，辭不就職。乃北上任國立北京女子大學校長，每兩週往返京滬一次。至十六年，北洋大學校長茅以昇先生延聘先生為理學院院長，不久津浦鐵路時有中斷，南北交通不便，遂辭職南下主持大同大學，成立校董會，推丹徒馬伯怡先生為第一任董事長，呈請國民政府立案，校內各科亦擴充為文、理、商學院，規模大具，校譽蒸蒸日上。當時文學院院長胡憲生，下設國學系主任朱香晚，外國文學系主任胡卓，社會科學系主任葉上之，哲學教育系主任由先生自任。理學院院長胡剛復，下設數學系主任吳在淵，物理系主任胡剛復兼，化學系主任曹惠羣。商學院院長沈鴻來，下設經濟系主任沈鴻來兼，商學系主任賀友梅，會計系主任楊兆熊，皆一時之選也。先生德配華夫人於民國十二年既前逝，至十六年二月在無錫與同邑張運橋望族顯顧人先生次女無錫蘇立女子師範學校校長毅媛女士結婚，從此中饋主持有人，先生亦得專心校務。而兩弟明復、剛復均在大同執教，翼贊甚多。其年暑假，明復因孀母喪回無錫堰橋，以天熱泗水遇難，僅年三十有七，遺孀薛教及二子一女尚幼讀。國民政府特申令褒揚，勒碑紀念。先生遺孀薛，愴失臂助，朝野尤痛惜此學術界奇才也。

無何，先生復應國立交通大學之聘，兼任工學院數學系主任，仍全力為大同擴建校舍，增設工學院電機、化工、土木、機械各系，教育部亦正式核准立案。方三年，學校基地擴至一百餘畝，先後落成典禮堂、圖書館、體育館、科學實驗室、學生宿舍等，四方學生爭往受業，校務正蓬勃發展，方興未艾。乃日寇侵滬，南市慘遭炮火，校舍都經兵燹。遂亟遷租界另賃律師公會大廈，繼續上課，越年始在新開路質得基地五畝許，自建四層樓校舍，陸續充實儀器設備暨增建房屋，以為附屬中學一院二院。馬董事長相伯遠以百歲高齡逝世諒山，乃由校董會改推黨國元老吳稚暉先生繼任。迨日軍進佔租界，先生仍堅持勿懈得以絃歌不輟，並鼓勵協助愛國青年，輾轉抵達大後方，更能蔚為國用。抗戰勝利，南市校舍修復，三十五年秋，附中一院遷回南市，大學部仍留新開路，肄業學生大增。值共匪作亂，上海各大學均有潛伏學生，鼓動學潮，擾亂後方，先生堅持反共立場，不肯隨和，共匪職業學生遂大興學潮，頻與先生為難，上海市長、局長，屢次蒞校疏導，然一夕數驚，糾紛疊起，先生亦心力交瘁矣。三十八年共匪渡江，勢侵淞滬，先生應湯總司令之邀，搭招商局最後輪船到達台灣基隆。在臺同學甚多，猶冀繼續為國培植人才，為恢復大同大學多方奔走，但格於政府政策復校無望，即膺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之聘，赴美國西雅圖出任客座教授，至民國五十年冬令輟發喘疾，不能到校上課，遂獲准退休。六十四年三月，先生九秩大慶暨顧夫人八秩壽，長子今中國石油公司董事長新南、媳朱西牧、次女德州州立大學醫學博士福南，婿徐象樞，次子應辰等咸率長孫兆鈞、曾孫世同，登堂舞綵，承歡晉祝，先生亦以四代同堂，含飴為樂，惟西雅圖地處北陲，苦寒日多，是以先生常發喘疾，每賴急救獲痊。去秋忽覺心臟血液流通滯鈍，每有阻塞現象，數賴氧氣急救，時發時愈，但仍不以為慮嚴重。十一月中，長子新南尚趨謁省視，仍談笑如常，惟以公務待理，不克隨侍醫院，匆匆返台北，不料纔歸旬日，十二月一日上午先生竟以心臟突然阻塞，遽歸道山，享年九十有四。顧夫人亦以中風昏迷臥床，僅次子應辰隨侍在側。長子新南、媳朱西牧、孫兆鈞、兆偉、兆強暨女福南等聞電奔喪，邊禮成服，已於同月九日上午卜葬西雅圖華興利長青 Evergreen, Washelli 公墓。從此一代學人，長眠異域，畢生心血，重建何日，桃李三千，已多異能知名之士，他日光復河山，祭告乃師，庶以慰先生樂育英才之素志也。



文字所出，歐陽公固極之賜也。」——（曾御史文敏——養吾齋集卷十），又如較劉氏稍後，而文名則遠勝的揭侯斯：「廬陵代為文獻之邦，自歐公起，而天下為之歸，……清寧廬陵人也。」——（吳清寧文集序——揭文安公全集卷七）而同時源出廬陵的歐陽玄亦曾於其圭齋集中有：「廬陵劉桂隱先生，卒葬之年。」——（故隱士廬陵劉桂隱先生墓誌銘）都顯然可以規知他們頗有人以郡家的思想。再如元末的王禮更曾自豪地作結論說：「廬陵始有歐陽子為一代儒宗，厥後節義文章之士，層見而疊出，……四方談忠節之邦，文章之藪，必歸廬陵。」——（靜春先生傳——麟原文集卷九），不過他們都只舉歐陽修而不提文天祥，那是多少對胡元有些避忌的，那麼，王實甫孝行卓異，賣身救母，一同拔跡於俘隸、下陳之中，則劉氏之特別標明其郡望，除了慣例，更有足為鄉邑生光之意。而且此時所謂「王、關西廂」已否產生？固然是一問題，即萬一有之，亦尚不至已流行至干戈甫靜的江西，會使此一正統文人此時已有寓目的機會。

錄鬼簿所載元劇初期諸家的里籍，本文前述，固會列舉其疏誤，同時我對於當時「大都」一詞的看法，此一金源舊都，過去既早已人物輻輳，況在胡元混一南北之後，它是首善之區的政治中心，人文薈萃的盛況，更不難想見；異地仕宦，留居大都的，由於聲位顯赫之故，同時的人們大致還會注意其原來里籍所在；若至市井布衣、或薄宦不達，甚至跡近俳優之流，自炫京籍，當時一般人未必會留心其原來里居了；所以元劇

初期諸家中，其多數一律被目為「大都人」，似乎不足為怪的。那麼此諸雜劇家若指其為曾寓大都或甚至久居大都之「大都人」固無不可；但若以為他們均為過去即生於大都，其後亦世居大都之「大都人」，則實未必盡然。即若我國過去之「南京人」「北平人」「重慶人」「上海人」以及今日所謂之「台北人」諸詞，是否即專指世居該地之士著？抑尚包括有其他里籍之寄居人士在內？則錄鬼簿上「大都人」一詞，我們應該是作同樣看待才對的。因此王實甫只要以廬陵人而久居或留居大都，便被認作「大都人」，在解釋上，應該是毫無窒礙；此點再容後述，現請先臆測其時代：然而我們要臆測此「廬陵實甫」之時代，且請先溯稽此文，此詩的作者劉將孫之時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略謂：「劉將孫，字尚友，廬陵人，辰翁之子，嘗為延平教官，臨汀書院山長。」新元史又：「子尚友亦能文，……與澄評其父子之文，……皆能成一家之言。」——（卷三三七劉辰翁傳）又譚嘉定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劉將孫：約元成宗大德前後在世」——（約公元一三〇二年前後在世）而同書又稱：「劉辰翁，景定壬戌廷試，入丙第。宋亡不仕，大德初卒。」按劉辰翁宋末遺民；但元初仍聲華籍甚，將孫之生，卒，從其季弟參於元泰定乙丑（二年）敗其養吾齋集後謂：「先兄養吾先生，自少時侍先君於古心江文忠公（按即江萬里）館中，學為文，出語驚人，……而吳澄之養吾齋集序，則自謂作於泰定丙寅（三年），蓋劉將孫之卒，可能即在泰定元年或稍前，若再從其父自謂：「穆陵進士，十文五

年嘗獨教授中都，百六十日講，又三年起從廬山公江東七閱月，……又七年，當德祐初元，召入館，辭未行，十月除博士，道已阻；去年廬山公以節死，論文忠——德祐二年戊午社日。」又「余年十三，以童子試縣學堂上，後十年而進士第一者亦於此：」「人註二十六」劉氏作前文時，殘宋當尚崎嶇嶺表，故題宋年月，後文則未題年月，所云「後十年而進士第一者，亦於此。」蓋當時文山亦或尚轉戰南服，故劉氏不得不略作隱諱，我們若以文山二十一歲即大魁天下言，則十年前即與十三歲之劉辰翁，同試縣學堂上推算，則文、劉之年當相彷彿；但文係實祐四年進士，劉則景定三年始入丙第，則其中式之時，已遲文山六年，當約三十歲了；若其句讀竟為：「後十年，而進士第一者亦於此。」則辰翁約長天祥十歲，中式之時當已在三、四十歲之間。所謂：「從廬山公江東七閱月」，以及「先兄養吾先生，自少時侍先君於古心江文忠公館中。則其當在咸淳二年，江萬里罷相（註二十七）」後二年，乃知太平州，兼領江淮茶鹽，兼江東轉運使。」之時（約在咸淳四年（一二六八）則劉將孫此時既待父遠宦，且學為文，估計其年齡當在十二、三歲左右，則劉氏之生年或為宋理宗寶祐元年（一二五三）前後，以送王實甫詩的前言未句中，稱其「吾子」而言，這兩人又顯係平輩的朋友，故王氏年代已隱約可測，若再從此文之「垂髫流落，從其母於鹵獲俘隸之中。」和「功名何用寧馨兒，不如之子髻髻哭相隨；堂上老公呼脫足，閣下郎君駭還目。」的詩句而觀，我們可知「老公」「郎君」

年嘗獨教授中都，百六十日講，又三年起從廬山公江東七閱月，……又七年，當德祐初元，召入館，辭未行，十月除博士，道已阻；去年廬山公以節死，論文忠——德祐二年戊午社日。」又「余年十三，以童子試縣學堂上，後十年而進士第一者亦於此：」「人註二十六」劉氏作前文時，殘宋當尚崎嶇嶺表，故題宋年月，後文則未題年月，所云「後十年而進士第一者，亦於此。」蓋當時文山亦或尚轉戰南服，故劉氏不得不略作隱諱，我們若以文山二十一歲即大魁天下言，則十年前即與十三歲之劉辰翁，同試縣學堂上推算，則文、劉之年當相彷彿；但文係實祐四年進士，劉則景定三年始入丙第，則其中式之時，已遲文山六年，當約三十歲了；若其句讀竟為：「後十年，而進士第一者亦於此。」則辰翁約長天祥十歲，中式之時當已在三、四十歲之間。所謂：「從廬山公江東七閱月」，以及「先兄養吾先生，自少時侍先君於古心江文忠公館中。則其當在咸淳二年，江萬里罷相（註二十七）」後二年，乃知太平州，兼領江淮茶鹽，兼江東轉運使。」之時（約在咸淳四年（一二六八）則劉將孫此時既待父遠宦，且學為文，估計其年齡當在十二、三歲左右，則劉氏之生年或為宋理宗寶祐元年（一二五三）前後，以送王實甫詩的前言未句中，稱其「吾子」而言，這兩人又顯係平輩的朋友，故王氏年代已隱約可測，若再從此文之「垂髫流落，從其母於鹵獲俘隸之中。」和「功名何用寧馨兒，不如之子髻髻哭相隨；堂上老公呼脫足，閣下郎君駭還目。」的詩句而觀，我們可知「老公」「郎君」

當指其祖、其父，由「垂髫流落」及「鬻鬻哭相隨」言之，王實甫此時之年，似當不逾十歲，而以「呼脫足」「駭還目」當時的情形來看，王家祖、孫、父、子、夫婦，本來是平靜家居，卻出乎意外地遭遇到游騎擄掠母、子以去；但是我們若以「從其母於鹵獲俘隸之中」細味，則擄其母者，並非盜賊，而正係蒙古騎；我們若以江西之遭受蒙騎蹂躪而言，前後計有兩次：一為「開慶元年（八月），蒙古破臨江，知軍陳元桂死之。」一「景定元年正月丙寅南康軍言：「北哨入建昌縣，狗咬石，透過武陵。」一「江西湖南帥司言：「大元兵破瑞州臨江軍城，與國、壽昌、洪、撫、全、永、衡諸郡民皆被兵，存者奔竄他所。」一「己亥詔：「全、岳、柳、象、瑞、與國、南康、隆興、江州、臨江、潭州、諸縣經兵，農民失業，應開慶元年以前二稅盡除之。」（註二十八）此事即指：「丙辰十一月移駐牛頭山，元良哈台略地諸蠻，由交趾，歷巒、桂抵潭州，聞帝在鄂，遣使來告。」一「世祖已渡江駐鄂州，遣也里蒙古領兵二千人來援，且加勞問，遂自鄂州之潯黃州北渡，與大軍合。」（註二十九）此支由南而北的胡騎當時擄掠人口之慘，可於宋人無名氏的續資治通鑑卷二十九：「景定元年，都省言：向士璧合劉雄飛追襲之兵，併力攻剽：救回老幼甚衆。」及宋史卷四十五理宗本紀：「大元遣偏師自大理由廣西抵衡州，向士璧會合劉雄飛，逆戰於道，俘民獲遺者甚衆。」一「覘知。而宋史且係托克托等所修，則易代之後，即元人自己竟亦不諱言此了。可是失之於湖南者

必然要取償於前述所經江西諸地，所幸此次蒙騎僅作線形北歸，其擄掠面是比較狹窄的。而第二次的大擄江西入口，當在此後約二十年左右：「十二年得生口十餘萬，悉縱爲民，仍禁其軍母得覓掠，十七年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省荆湖，掠民爲奴婢者禁之。」一又十三年五月，阿里海牙以所俘童男、女千人，牛萬頭來獻，中統十七年戊辰，敕相威檢覈阿里海牙、勿都帖木兒等，所俘丁三萬二千餘人並放爲民。」（註三十）此次俘掠宋人之衆，獻、釋均見諸明文者，已自可驚，而大將等私隱之奴俘恐尙遠過此數，即如阿里海牙之：「土田宅第賜在湘野：僮僕千億，是耕、是稼。」（江陵王新廟碑）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九」，便可覘之了。而當時江西女性之遭殃則：「大橋名清江橋：有無聞翁賦：沁園春、滿庭芳之闕，書避亂所見女子，後又有螺川楊氏和二首，自敘：生楊、人嫁羅：追騎迫，間道入山，卒不免於驅掠。」一又「是管贖俘虜之母于邑大夫，以付准備。責名家之女子歌筵，以還其夫。」（註三十一）我們由此可知，不幸的南朝金粉，所遭遇北國鐵騎的厄運；但是我們若從劉將孫贈予王實甫詩的前言中：「廬陵實甫，垂髫流落，從其母于鹵獲俘隸之中。」留意，似卻又並不在南宋淪亡之際，因爲遭此不幸的時候，「廬陵實甫」正值鬻鬻之年，若在宋恭帝德祐元年、二年（一二七六一一二七九），元軍侵入江西時，爲阿里海牙、張宏範、或李恒等，南向逐宋之師所俘，則嶺南之距贛南，固不得謂爲：「萬里母前谷子後」地歸來，而且若假定崖

山之覆以後，十年始歸，則十七、八少年竟與長其二十餘歲之劉將孫交遊，則亦非常情，又劉詩所謂：「風霜伶仃母良健，一食南海母養之。」和其文中：「卒從實身得贖，并贖其母以歸故鄉，爲貧逐食，復奉母依所爲主於南海上。」一相互參驗以觀，其母被贖時，應在北方，「一食南海」只是初次，又顯在贖歸故鄉之後，而此次這些元帥又尙未北歸，豈非被他們所俘；至若逕以其後元之擊緬甸、征占城、破安南，沿途所俘，我們如仍以爲宋亡贛破時，王實甫才十歲左右，則此諸役時近者相距四、五年，遠者約七八年，如王氏被俘時，已爲十六、七少年，既非垂髫流落也更不是鬻鬻哭相隨了。假使是奉母覓職，逐食南至嶺海，此時又該不是十幾歲少年了。所以合理的解釋，應該是「廬陵實甫」，早於第一次蒙騎南征、北還時，隨母被俘，而在崖山之役以後才贖母南歸，並且逗留故鄉，曾有相當時間，故與劉將孫交遊，則其生年，當在宋理宗淳祐十年（一二五〇年）前後，較諸劉將孫之生於寶祐元年（一二五〇年）前後，雖似稍大而相距甚近，故相互爲友，便很自然，按前引之註二十八所載：與國、南康、臨江、高安（瑞州），這些地區，都是廬陵郡南北鄰近之地，而廬陵之當時轄地，計爲：「吉州（上）廬陵郡縣：廬陵、吉水、安福、太和、龍泉、永和、永豐、萬安。」（見宋史地理志：卷十一）其範圍之廣濶由此可知；而且元人廬陵王禮曾謂：「廬陵西北鄉，多王氏。」一又先世自仲舒（唐人）觀察江西，子孫因家焉：謂往在章貢管與七里鎮者通譜；而茅堂、棟頭亦

東 方 雜 誌

皆族也。——(註三十二)則王氏一族分佈之廣又可知，雖然宋理宗開慶元年，蒙古兀良哈台旋師北返，史籍未載明攻破廬陵郡城，可是我們若觀前引所述胡騎蹂躪的鄰近地區，則廬陵所屬各縣的鄉郊，自然很可能也都是他們呼嘯而過的地區，所以這位「廬陵實甫」母子之被俘，應該便在此時了。

由於上面種種推證，「廬陵實甫」的生年，故鄉應以爲約當宋理宗淳祐十年(一二五〇)前後，而另一「大都實甫」的生年，由金入元之說的兩點理由既均難確立，已如前述；而今人羅錦堂教授的相異主張，則以爲：「王實甫名德信，其生平不詳，年代似較關漢卿稍晚，約生於一二四〇年左右。」(中國散曲史：前期的清麗派)但羅氏既未言明依據何書，亦未述及其推定理由，但以筆者的管見，則以爲王氏生年，實未嘗不可以幾種錄鬼簿版本中，所載諸家姓字排列的次序，試作比較合理的推定，該是一條新的途徑：請試看下列簡表：

下列四簡表，概以節錄此書前列十人爲度，其中排列雜劇家的姓、字(名)明鈔說集本與明孟稱齋刻本，除了排列的次序外，可以說無什麼變化；但是明天一閣藍格鈔本，則無：侯正卿、史九散仙、李文蔚、孟漢卿，而代以汪澤民、楊顯之、陳寧甫、李壽卿四人。清曹寅棟亭藏書本，則無侯正卿、史九散仙、孟漢卿，而代以鄭廷玉、李直夫、吳昌齡，這些現象，自然是後人的改動，而改動的理由；雖然可能是對他們生卒年代，各抱己見的關係，今日我們固不易輕下斷語

錄 鬼 簿

姓名(字)	關漢卿	白仁甫	庚吉甫	王實甫	高文秀	馬致遠	李文蔚	侯正卿	史九散人	孟漢卿
本	關漢卿	白仁甫	庚吉甫	王實甫	高文秀	馬致遠	李文蔚	侯正卿	史九散仙	孟漢卿
二	關漢卿	白仁甫	庚吉甫	王實甫	高文秀	馬致遠	李文蔚	侯正卿	史九散仙	孟漢卿
三	關漢卿	白仁甫	庚吉甫	王實甫	高文秀	馬致遠	李文蔚	侯正卿	史九散仙	孟漢卿
四	關漢卿	白仁甫	庚吉甫	王實甫	高文秀	馬致遠	汪澤民	楊顯之	陳寧甫	李壽卿
姓名(字)	關漢卿	高文秀	鄭廷玉	白仁甫	庚吉甫	馬致遠	李文蔚	李直夫	吳昌齡	王實甫
本	關漢卿	高文秀	鄭廷玉	白仁甫	庚吉甫	馬致遠	李文蔚	李直夫	吳昌齡	王實甫
二	關漢卿	高文秀	鄭廷玉	白仁甫	庚吉甫	馬致遠	李文蔚	李直夫	吳昌齡	王實甫
三	關漢卿	高文秀	鄭廷玉	白仁甫	庚吉甫	馬致遠	李文蔚	李直夫	吳昌齡	王實甫
四	關漢卿	高文秀	鄭廷玉	白仁甫	庚吉甫	馬致遠	李文蔚	李直夫	吳昌齡	王實甫

不過其中仍有其不變者在：便是關漢卿在這四表中，一直都雄踞首座；另外明版三表中，白仁甫(樸)都在次席，只有清代曹寅的刻本，白氏才移於第四，仍與關相距不遠，而時代比較稍晚的馬致遠第一表居於第六位；第二表則居第五位，第三表亦列第五位，第四表則列第六位，從這些我們可以窺之，諸版刻印名次雖各依己見，但仍都是以時代次序爲原則而排列的。而「大都王實甫」在此四表中的座次則爲：第一表列居第四；在高文秀、馬致遠前；第二表則緊接馬致遠之後，退居第六，第三表則仍接伍馬氏，位亦第六；惟第四表則顯踉蹌，王氏竟殿居十人之末。其中比較須注意的天一閣本有賈仲明序言、和若干首凌波仙讀詞，基此，可窺此本的諸家姓名(字)是很可能經過賈氏安排的，賈氏亦爲元末雜劇家，他於這方面所知，當不較鍾離齋遜色；我們

若再綜合他表以觀，則王氏的時代，要較關、白爲遲，應該與馬致遠大致相彷彿。而馬氏之生卒年代，有人認爲：「約公元一二五一年前後在世」，也有人認爲他：「約生於元世祖中統初，卒於泰定帝時。」另一說：則爲：「他的生卒年是二二五〇——三二二二前後。」(註三十二)大體言之，其實這三說所主張的時代距離都是極近的，那麼基此以觀：「大都王實甫」之生年約在一二五〇年左右或稍前，這不但接近了羅錦堂氏的意見，而且也吻合了「廬陵實甫」生於宋理宗淳祐十年的推定，自然也便增強了兩人同爲一人的可能性。

○「廬陵王實甫」兩度留寓大都的臆見
蒙古時代南征交趾之師，沿途大掠北返的主將，從元史和同時宋人的記載，其主將乃爲兀良哈台，另則常爲前鋒的，便是後來參加滅宋之役

的其子阿朮，而蒙古將領之喜歡聲伎，我們從「教童、妾為歌舞行觴，以娛親賓。」游意絲竹：老而不衰。」（註三十四）這些和他們同時文人的記載，可以證明，所以劉將孫送王實甫詩中的：「風霜伶仃母良健，一食南海母棄之。」「風霜伶仃」之意與「一食南海」相對，顯然是指的王母離會久留北國風霜之中仍依然健在，而竟難禁南海片時的炎瘴以死，「雲翻雨覆落干戈，巢破卵碎同網羅；斷等啖臂不得死，織履賣燭吁奈何？」這些話：一方面說明了王母當時本有全節自裁的烈志，但所志不遂，才不得不受迫而淪為樂伎的。至若「織履賣燭吁奈何？」「賣燭」或作分光照夜織解？然魏武遺令則有「遺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故此句之意亦當在此，那麼這些樂伎的主人，雖然不是元主，則其勢位之高，也應當與曹操在東漢的官、爵多少彷彿，我們今按新元史：兀良哈台：「至元九年（一二七二）卒，追封河南王，諡武毅。」（卷一百二十二附速不台傳）又其子阿朮：「十三年（至元）實封泰興縣二千戶，尋受命討叛王昔刺木等，卒於別失八里軍中，時年五十四（至正二十四年（一二七八））」（同卷同傳），且亦追封河南王，然以時計之，王母之迫充下陳，或即在兀良哈台府第，兀死時之「廬陵實甫」，隨母於絲、竹、綺、羅中長成已屆弱冠，若至此時「賣身自贖」，則即其甘為歌童、舞兒也並非牽強的想像，而況其母此時早已三十餘歲，年長色衰，主者既死，淪入織室，所以「并贖其母」便亦不是難事。惟「復奉其母依所為主

於南海上」，自指王實甫賣身的舊主而言，此人當亦為一元軍將領，至於姓名誰何？我們便不敢妄測了。但是其母死後，王氏返鄉葬母完畢，又作遠行，我們從劉將孫的前言和詩裏，不難看得明白，並且我們從：「即有以處吾子於死、生、患、難之間矣。」所以他的遠行，便很可能是前往參加戎幕的，不過他是否二度北去？北去後，曾否留居大都？這些我們在劉將孫氏的一文、一詩中已不易找出資料，可是我們仍可以其他二三點傍證理由，說明他此次當是二度北上的。

其一：劉將孫之父劉辰翁曾有這樣一節文章：「吾鄉金地王氏，北來季雅，以十八世孫，譜宋而上，又譜金地而上；又南又北，得不失姓難；獨先河後海，跋涉不墜又難；而金地稱「世祖」亦非也，非有其田若祠以存，後世其知有長者哉？其存又不以譜也。」（註三十五）又元人廬陵王禮亦謂：「：先世至唐仲舒觀察江西，子孫因家焉；亦以為自金地長者，曾伯祖南安教授府君有序謂：「往在章、貢嘗與居七里鎮者通譜，而茅堂、棟頭亦皆族也。」：謹題所聞於此，以復大年兄，何如也？」」（註三十六）劉、王二文中之「金地」，我們從「又南又北」「先河後海」等語，可以規知，即是指的金人統治下的中原，再從其他片斷的語句，更可知金地的王氏曾有一支遷入江西，與當地的王家聊宗通譜，至於王仲舒之為唐代的北人，這兒便不贅說了。所以王氏如為由北南遷的一支，則北方本為自己桑梓的觀念，可能正是這位「廬陵實甫」，再度去北和留北的動機之一。

其次：我們從元史和元人各家文集中，南宋初亡時，北人蒞官江西的文學家，舉其大者如：姚燧、如甲屠致遠和滕玉霄、盧摯（後二人且為大負盛名的散曲家）皆其顯例。而同時江西文人顯榮元廷的：較早的程鉅夫，稍後的吳澄，都約與此王實甫同時，而時代略遲的：揭傒斯、歐陽玄等，他們也都聲光喧赫，足為鄉邦之榮，那麼江西文人，受了這些人事原因的鼓勵，他們北上干祿，也便成了自然的趨勢，即如劉將孫：養吾齋集中之：送劉文州序、送婁易總北行詩卷、送李生七古、送劉復道士隨主人進京并寄蕭與道，若察其內容，都是劉氏送別廬陵或其附近的文人或羽流，北去大都的；所以此一「廬陵實甫」，母死歸葬故鄉以後，由於家貧（可能其父亦死，或早已不認其母子。）不得不遠行逐食，然而由於他原有留北的人事關係，再加上南來江西的北人顯貴和在北宦達的可以攀援之江西同鄉，他既子然一身，則北上干祿於輦轂之下，固為文士慣例，而薄宦不達，年華老去，故鄉又近親零落，則其留寓原有桑梓關係的北方，自亦有其可能；然而這些主觀的推理，仍不足完全肯定其人去北、留北之說，但我們若再細作紙上的追蹤，卻也發現出部份客觀的有關係線索，現在再抒鄙臆，試言其疑：

元廷自世祖即位，即有其弟阿里不哥的確據和林稱帝，雙懸日月不肯為下，平宋數年之後，又有宗王海都等之叛，規模頗大而延連較久，所以我們從劉將孫氏的「即有以處吾子於死、生、患難之際矣。」而假定「廬陵實甫」再度北上之

當爲參加戎幕；然而王氏卻並未埋骨黃沙而仍在大都出現，從下列兩段文章中，大體是有其證明價值的：首如：「清江皮使君，治南恩有惠政，一日自免去歸老；廬陵王實初賞其高節，以淵明歸去來圖，求朝中學士大夫賦詩，選以爲壽。」（揭文安公全集，卷二：題淵明歸去來圖）按揭侯斯江西富州人，其生卒年代爲二二七四至一三四四（註三十七）中，晚年均久仕元廷，卒於大都（元史有傳）。此文之「清江皮使君」，元人諸籍已難鉤稽，所幸清同治刊本臨江府志，尙可多少得覘其梗概：「皮元字次翁，由神童歷官南恩知州，所至有聲，以朝列大夫、贛州路同知致仕，自號如心。」（卷二十一：宦業：元人物傳）按元史卷三十一選舉志：「其策名荐學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言、有進書、有童子。」又同書、同志：「大德元年徵臨川布衣吳澄，擢應奉翰林文字；大德三年舉童子楊山童、海童。五年大都提舉學校所舉：張泰山、江浙行省舉張昇甫。」（新元史同）此蓋擇尤而言，實際錄取人數當不止此，故皮元之由神童歷官南恩知州，兩元史雖均未載其名；而吳澄之吳文正集中有皮昭德詩序（卷十五）皮季賢詩序（卷十五）皮達觀詩序（卷十六）皮魯瞻詩序（卷十七）等文，我們若再從江西通志列傳：臨江府（清江）卷一百四十三並謂：「皮潛字德昭，清江人，以父南雄總管蔭，補邵陽丞；少受業於吳澄之門。」云云，則此皮元當亦皮氏子弟，且可從吳澄應徵於大德元年，而元廷大德三年始創童子舉，則皮元年齡自較吳氏爲小，而我們再據吳氏門人危

素之吳澄年譜（附吳文正集）言其生於宋嘉祐九年，卒於元文宗至順二年（一二四九年）至一三三一年，則可知吳氏生年約與「廬陵王實甫」約相彷彿，而揭氏此文中：「賞其高節」之實字，顯然有領許之意，蓋此王實初之爵位雖不高於皮元，但鄉黨論齒，這一「賞」字，告訴了我們，他當是居於長者地位的；不過揭氏稱「廬陵王實初」而不冠官銜，可知其人當薄宦不達，但我們再從：「求朝中學士、大夫賦詩選以爲壽」言，則至少此王氏當亦會爲元廷微官而久居大都，始可有如此人際關係；至於選以爲壽，則其時王已休官，才有此閒暇，而「選」者，也只是暫歸江西祝壽而已。又吳澄另有王實翁詩序說：「王實翁爲詩，性情流出，自然而然，充其所到，雖唐元、白不過如是。」（吳文正集：卷十八）當亦即指此人；我們若從：「以淵明歸去來圖」云云合觀：則這位王實初，實在是詩、畫兼擅，深游於藝的一位人物。而今傳王實甫退隱散曲，（商調）「集賢賓」中：「看萬里冰綃染就，有王維妙手總難酬。」等語，則又可見「大都實甫」也至少是一位對山水畫很有興趣的文人。

我們再從另一位同時元人的一篇短文所述：「余從王實初先生得其族孫德生詩賦一帙，讀之，渾注奇駁，筋骨甫壯，其馳騁未有紀極也；他日範以王良、造父之法，納之和轡大輅之下，則才氣老矣，三復題而歸其帙。」（歐陽玄：圭齋文集卷十四：玉大年詩帙）按歐陽玄爲元廷延祐二年第一屆進士，（當時「廬陵實甫」應已年逾六十，參加科場的可能性甚小）效節其本傳，以推其生卒年代及有關本文者如下：「至正改元十四年汝穎盜起，十七年春乞致仕，是歲十二月戊戌，卒於崇教寓舍，年八十。」（歷官四十年，在朝之日殆四分之三。）（元史：卷八二卷：歐陽玄傳），我們若自元順帝至正十七年，上溯至宋度宗咸淳九年，則歐陽生年亦在一二七四左右，與揭侯斯相若，其稱此王實初爲先生，更顯係自承後輩，但他不稱王「前輩」，「先輩」或「年兄」，亦多少可見部份明人，以王實夫爲元進士是不可信的。但此王實初之年，卻是可以確定要高於歐陽玄的；我們再從歐傳：「歷官中外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以觀，則王氏祖孫既然請他評題詩冊，以常情論，自當在其已在京享名之後，故此文之作，亦極可能即在大都，同時此文又不稱其官銜，我們更可肯定此王實初，確是如前述之薄宦不達的人物。而此文中提及之「玉大年」、「德生」，我以爲應即前引王禮文中之「歸復大年兄何如也」，之玉大年；此人似不僅工於詩文，且亦兼擅繪事，我們又可於元末廬陵張光弼（昱）的可開老人集中之：題玉大年畫五絕一首（卷一）得之，此君雖亦名位不達，如以張昱之時、地作爲傍證，則其即王實初之姪孫，似少可疑。現在走筆至此，我將提出此一揭侯斯文中之「廬陵王實初」，極可能即係劉將孫文中之「廬陵（王）實甫」，其理由有三：（一）「初」「甫」二字，含義相同；「父甫也，始生已者」（劉熙：釋名）「初：从刀、衣（會意）裁衣之始；用刀則爲製之始，引伸爲凡始之稱。」又：「甫：男子之美稱也；以男子

始冠之稱，引伸為始也。」(段注：說文解字)又如近出之形、音、義大字典亦以為：「甫：同訓異義字為：初、始、創、肇、昉、首」而「初同訓異義字為：始、肇、創、首、昉」，又：「從一大則為天，從大一則為夫，……以象先，先首聲也。」由此已足概見。

(二)從改字為「初」的用意看：我們可從：「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訛。」和「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又「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詩經：王風：兔爰三首)——由此足覘此王實甫之改「甫」為「初」，是顯然憤懷身世，才有此舉，甚至「有兔」云云，亦未嘗不是暗寓自己竟有曾一度賣身淪為歌兒、舞童之流的痛史的。

(三)最末我們所持的旁證，便是元代江西文士之改字，不但可知其是一種風尚，而且還隱約可窺其原則，刻引下列兩例以證：傅君初字汝礪(新喻人)，余以天下同其姓字者眾也，而易之曰「與礪」，且「與」「汝」聲相近而便於改稱也。——元統三年揭傒斯序(揭文安公全集：傅與礪詩集序)又如：「大江南北，有士王禮字白子尚，以字行於世，幾四十年矣，「讓」之與「尚」又聲相近而易易：」(麟原文集、前集卷十一：易字子讓說)，這樣可見傅、王二人都是「原字使用已久，才加改易，而他們改字的原則，便是「聲相近而便於改稱」或易易；那麼王實甫

改為王實初，「甫」「初」二字，它們不僅同義，而且論聲音則韻母同疊，更不止於其「聲相近」了，所以根據以上三點理由，「廬陵王實甫」與「廬陵王實初」，再加上時代的吻合，同為一人的可能性是極大的。不過他的改字動機，因為沒有留下和傅若金「與礪」和王禮「子讓」同一性質的文章來說明原因，我們今天只好暫作下列兩途的推測：第一他如因不願與雜劇家王實甫同字；不過此時若從金入元早已真的另有其人，則其二十歲左右(一般社會習慣，是先冠而後字的)在大都便不會取此同字，如雜劇家王實甫時代與其彷彿，則其奉母由北南返廬陵的前後，即應改字，但他卻並未改，由此可知其改字的時間，很可能已在晚年，而動機則未必便由於與他人同字有關。第二：我以為他二度北上留居後，方才改字，是很可能在他中年已作了西廂記等雜劇以後的事，他之所以要如此作，很可能是他久居大都，既常與吳澄、揭傒斯、歐陽玄等，當時享有盛名的正統文學家交遊，而這幾位又都是：「……同遊於許白雲(謙)之門，以翼斯文，相砥礪。」(見前)的理學人物，如此自易在無形中，使其悔作「浮艷之詞」的諸種雜劇，發生了道德的內疚，因而改字自晦，並紀念其悲辛的童年，世傳他的退隱散曲，(商詞)「集賢賓」中「想著紅塵黃閣，昔年羞，到如今，白髮青衫此地遊。」這「羞」字不但似乎在說明了他屈辱的童年和青年，這也是他散曲少傳，生平不彰的一大原因。

由於前文所述已大致可證明，劉將孫筆下之「廬陵實甫」，即係揭傒斯、歐陽玄集中之「廬陵王實初」，晚年改字而留居北方，但是我們現知的材料，只能明其能詩、能畫，並有一悲劇性的童年身世，而無法證實他竟是雜劇家中一大手筆，然而我們若從某些方面來作推論，他即雜劇家的「大都王實甫」的化身，似亦應呼之欲出：

甲、文學：我們從劉將孫送王實甫詩的各句所用典故，例如：「絕裾兒將母絕域」——(用東晉溫嶠事)「伏劍兒相母無骨」——(用西漢王陵事)，使事已不太通俗；而詩末前二句之：「陸保錦袍哀久羈；建中望斷沈婆兒。」前句指北周宇文護之母；後句則言唐德宗失母之悲，僻典更不尋常；則被送之王實甫，文學修養，由此也可概見，王實甫童年、青年均從母於齒獲俘隸之中，其文學修養由於其母的教育？或曾另有師友，我們不敢妄測；然而當時大都既成為政治中心，自然也成了文學中心，既有如此人文環境，孕育成王實甫的文學基礎，固已應為十分可能的事；而況於其南返廬陵故鄉之後，廬陵是：「東南百五十年來，文字為盛。」的地方，故其易得名師、益友之助，更不是困難的事，我們若再具體以言，劉將孫、固然已可確定為其益友，而宋亡後猶聲華籍甚的劉辰翁，以其門下品類之雜，如：「……昂夫西域貴種，……蓋昂夫嘗執弟子禮於須溪先生之門；其有得於須溪者，當不止是。」(趙孟頫：松雪齋集卷六：薛昂夫詩集跋)按薛昂夫即馬昂夫、九泉、亦即薛超吾(劉將孫有：送薛超吾敘九泉詩集序二文)，非我族類的回鶻人尚

五、「廬陵(王)實甫」之文學、音律、戲劇的環境

列門牆，則王實甫以同鄉孝子，其子好友，而當時得遊劉辰翁之門，應該是很自然的事情；且宋人之制：「凡於進士，試詩、賦、論各一首。」（宋史：卷一〇八：選舉志一），而劉須溪於宋景定三年內第中式，其精嫺律、賦之學固不必說，而劉將孫久從其父學文，自亦擅此，故王實甫所受他們的影響，更在意中，若再從「吾鄉詞、賦見稱東南。」（劉將孫：養吾齋集：卷十三：送劉桂翁詩序）以言，則更可見王氏居鄉的一段時間，可能尚與更多的詞、賦之士作過切磋。那麼我們更無怪清人之引：「法鼓金鏡，二月春雷響殿角；鐘聲佛號，半天風雨灑松梢。」等句，而讚嘆：「西廂之于駢儷，美不勝收。」（註三十八）了。

乙、音律：我於前文曾由劉將孫：送王實甫詩中：「斷筆嗟臂不得死」，而臆定王母被迫淪為樂伎，則此隨母苟全的「廬陵實甫」，應該是在音樂環境中長成的。同時我們更須知元初的時代，雖然真正的士大夫不作雜劇，但是大家對曲調的音律，大都與江西南、北地方，仍可各有不少人士當作同樣的注意：「敬齋（李治）先生晚年以歌酒自娛，每興來，輒持空杯，令門人謔生放聲長歌，或不如指，遂執其手而高下之，使視焉，以諧其節奏。」（註三十九）又「公諱本，字誠夫，初諱克信，世燕人，尤嗜駢儷樂府，管慮二者絕學，規規然，必以中繩墨，循律度為任。」（註四十）宋本則為時代稍後之元廷顯宦，二人於元史均皆有傳，我們從此兩節記載，自可感當時北人度曲之熱；名士、顯宦既尚如此，恒流之

靡然成風，當更可想見了。何況王氏自幼從絲竹、綺、羅中長大，在如此的環境中，當更易於發生音律的興趣。迨其南返廬陵，而同時這一地區的文士，對音律注意的程度，又似乎也不在幽燕之下，即如與王氏有關的劉辰翁父子，我們便先可從其著作中，窺其端倪：例如劉辰翁：「刻有北韻南來，簡便同文，又勝昔之韻略。」（須溪集卷六：北韻序）此序當作於宋亡之後，與王實甫初後返鄉之時間，似應彷彿，而其書或尚早於周德清之中原音韻。又如劉將孫之文：「今、曲行如七絕句止耳，未至一長一短，而有譜與調也，今曲、行而參差不齊，不可以充口而發，隨聲而協行；然猶未至於大曲也，及柳耆卿輩以音律造新聲，少遊、美成以才情暢制作，而歌非朱唇皓齒必負之矣，自是以來，體亦屢變，長篇極於大酺、大醜、蘭陵，無不以反復浩蕩而豪於氣者，以為憑陵大叫之資。風情才子，乃宛轉作屏幃呢呢以勝之，而詞亦多衝突。近年趙聞禮集：陽春白雪（按此書乃詞選，異於楊朝英之陽春白雪所輯設曲。）如稱大成、稱妙選者數十家，未整然歌喉，所為喜於諸婉者，或玩辭者所不滿；騷人墨客樂稱道之者，又未知音者有所不合。新城饒克明盛年有志於事，以美成為祖，類其合者，調別而聲從之，近年以之鳴者，無不有，且四方增益而刻布之，予以其主於調也，為其言歌焉。」（養吾齋集卷九：新城饒克明集詞序）這

篇文章雖指詞的唱法，然而既言及大曲，已不是純屬宋詞的範圍，本來元人詞、曲不分，近人所謂：「曲之見於小令套數者，亦文人學士抒寫懷

抱之具，與詞同功，但變其體格耳；然周德清：中原音韻論作詞十法後，定格四聲之所謂詞，趙子昂所謂：「倡夫之詞，名緣曲也。」皆曲也，是元呼曲為詞矣；至燕南之庵論曲，最近所謂大曲曰：蘇小小、蝶戀花、蘇東坡、念奴嬌；辛稼軒、摸魚子；蔡伯堅、石州慢，皆為宋金之詞；又論唱曲有地所：東平唱：木蘭花慢；南京唱：生查子等，亦皆詞也，是元人又呼詞為曲矣。」（註四十一），其實元人文集，詞、曲往往統名樂府，例如虞伯生（集）中原音韻序：「以周德清為：工樂府，善音律。」文羅宗信之另序，亦謂：「引吾吉素稱文郡，非無賞音，自有樂府以來，歌咏如山立焉，未有如德清之述也。」這些話顯然他們所謂「樂府」都是詞、曲兼包的。同時這兩篇文章雖然較遲，但由此可窺知江西人作散曲的時間卻早於中原音韻之前，而且此第一部作曲專書，也竟出於江西人之手。故劉辰翁所云：「北韻南來」，尤其是「二個明證。另外北方的散曲名家，如廬陵齊（擊）、滕玉霄，都曾提學江西，而與劉辰翁交遊（須溪集卷七有：代廬擊乞致仕牒，卷七有：贈滕玉霄入京啓），而這兩位之曾遊官江西，都約在南宋崖山之覆至元成宗大德初的二十年間，而正是我們推定，王實甫奉母南歸廬陵的期中，另外異族散曲家薛（馬）昂夫，遊於須溪先生之門，當亦約在這個時期，散曲是雜劇的基礎，所以王氏的南返，我們雖然無從推定他留鄉多久（兩度返鄉，當不會太短。）然而卻可斷言他仍然置身在注重音律的文化環境中，飽受薰染。

化環境中，飽受薰染。

丙、戲劇：前文我們曾經推定此一「廬陵實甫」之生年約當一二五〇年前後，而王惲中堂事記下：「是日高麗世子禎來朝：詔、翌日都省官與高麗使人每(們)就省中戲劇者」(秋澗大全集卷八十二)，按兩元史高麗世子之朝，時在元世祖中統二年(一二六一)，此一「戲劇」我們據王靜安先生：「至有元一代之雜劇，可分為三期：一蒙古時代：此自太宗至元一統之初。：」故當係指雜劇而言，則此儘管正統文人的眼中，對之不予齒數，但它躋升廟堂，用娛國賓的盛況，又顯然不可抹殺；而當時另外一部份顯官、文豪對坤伶的醉心如：「珠簾秀，姓朱氏，雜劇為當今獨步，顰頭、花旦、軟末泥等，悉造其妙。胡紫山宣慰，嘗以沉醉東風曲贈，馮海粟亦賜以鵲鳩天，關已齋(漢卿)亦有南昌數套，梓於陽春白雪，故不錄。」(青樓集)。又其後楊朝英所輯之太平樂府中，我們又見盧疏齋(摯)與珠簾秀贈答曲以外，而我們還可於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中找出：「題珠簾秀後」(卷二十一)「曹氏詩卷序」(卷四十三)「銅台阿丑石氏疏」(卷七十)「樂籍敖氏釀金疏」(同卷)和胡紹開(聞)、祇遙的紫山大全集中：「朱氏詩卷序」(卷八)「黃氏詩卷序」(同卷)「贈宋氏序」(同卷)優伶趙文益詩序」等文，都是捧述坤伶、或優人的；胡氏雖「以講明道學之人，作媒狎倡優之語，其為白璧之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見譏後世，但是由於他們當時衝破傳統壓力而對雜劇的狂熱，我們才不難想像雜劇流行大都的盛況；按胡紫山生於金哀宗大正四年

卒於元世祖至元三十年(一二三七一—一二九三)；王惲則與其同年出生而遲卒。(卒於大德八年，公元一三〇四)盧摯則生於元太宗七年，卒於元成宗大德四年(一二三五一—一三〇〇)馮子振時代稍遲，其年當與王實甫相若，然王、胡已成名臣，正入中年；關漢卿、若據胡適之、盧元駿二氏的主張，則其年亦正與王、胡彷彿，故他們中年以後對雜劇狂熱的時代，正是王實甫第一次留北的青、少年的時代，以一個逐漸在絲竹、綺羅中長成的人，自幼會受當時雜劇流風所感染，已應該是十分自然的事，何況王氏實身自贖，本身又有淪為歌兒可能，至於王實甫南歸廬陵以後，此時江西的戲劇氣氛，我們也可從豐城王義山，以亡宋大夫而為元人江西儒學提舉時，即曾於隆興府(南昌)於崇壽節(太后生誕)排演過：「對廳致語：「俯陳俚調，揚厲休期：」底下接著：「勾問隊心」「花心唱」「四角唱」「遣隊」、「勾隊」、「吳仙詩」(唱)、「謔仙詩」(唱)、「鶴仙詩」(唱)、「龍仙詩」(唱)、「仙詩」(唱)、「遺隊」、「王母祝語」(唱)、「勾隊」、「萬年枝詩」(唱)、「長春花詩」(唱)：：(見王氏：稼村類稿卷二十九)今節錄其節目，可見當時降臣之獻媚胡媚，是以排演宋代所遺的大曲來祝嘏的，從這方面，我們另外又可以看出兩點：一宋亡之初，雜劇可能尚未流行至江西。二大曲演奏的規模大角色不少，排演不易，而吟唱諸伶，在本地卻竟似不難物色，這可見江西戲曲的風氣不弱。而其他劇種在該地的發達，另有更值得我們注意的：王靜安先生以為：「

至與戲劇更相近者，則為傀儡：則宋時此劇實與戲曲同時發達，其以敷演故事為主，且較勝於滑稽劇，此於戲劇之進步上，不能不注意者也。」(宋元戲曲史：宋之小說雜戲)而宋亡前後，江西傀儡戲之發達，則可於後引文、詩中之片段觀之：「玉峰朱明氏，世習窟壘家，其大父應俳首謁前，：辯舌歌喉又悉與手應，松帥韓侯，宴余偃武堂，明供群木偶，為尉遲平寇，子卿還朝：」(楊維禎：東維子文集卷十一：朱明優戲錄)故以時推之，則傀儡戲之以道白、歌唱，敷演故事，當尚早於雜劇。而其內容且更繁複者，楊氏門生貝廷臣(瓊)云：「玉山窟壘天下絕，起伏進退皆天機，：流蘇帳下出新劇，河梁古別傳依稀：黃龍嶺裏胡雜話，李陵台前漢使歸；當筵舞劍不辟客，頓足踏地爭牽衣，玉簫、金管靜如水，西夏、東山相是非：」(貝瓊：清江貝先生集卷三：玉山窟壘歌)，更可見此一劇種之表演方式，道、白、歌唱以外，尚有不少動作，而且還以音樂配合演出，王先生所謂：「此於戲劇進步上，不能不注意。」其微旨當在懷疑，雜劇之發生，傀儡是重要的淵源。而楊文「玉峰」、貝詩「玉山」實在是均指江西玉山縣而言的，所以我們也由此可知，廬陵王實甫之少壯還鄉時期，該是正值江西傀儡戲的全盛時代。然而綜上三點，都還只不過說明了南北環境的影響，有產生這樣一位偉大雜劇作家的條件而已，圈子也許過大，下文我們請再言其主要作品和其間的東南氣息。